

《三国演义》论文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三国演义》论文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了一九八四年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三十多篇，体现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新成果：对这部名著的主题的新提法；对人物研究的新开拓；对艺术成就的新探索；对小说在我国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新估价。可为文学及小说研究者的参考资料；也是青年读者学习古典小说的理论借鉴。

《三国演义》论文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新予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图书馆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 印张 355 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统一书号10219·86 定价2.85元

序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学学会，受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的委托，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汉魏故都洛阳召开了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三个省、市的科研机关、高等学校与新闻出版单位的一百七十多位代表，其中有年逾古稀的专家，有年富力强的学者，有风华正茂的新秀。代表们欢聚洛浦，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古为今用”的精神，就《三国演义》的主题、人物、艺术、版本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今天奉献给读者的《三国演义论文集》，就是从代表们提交的七十多篇论文中精选出来而编定的。这个集子展示了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这次盛会的学术水平，其特点有四：对主题有新的提法；对人物研究的范围有新的开拓；对艺术成就有新的探索；对小说在我国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新的估价。这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可喜收获。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有待发掘突破。当前，摆在《三国演义》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考证作者与版本源流，而且尤应研究它蕴含丰富的思想认识价值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并且把它放在中外文学名著之林中进行比较，全面地总结它所提供的宝贵的艺术创作经验，批判地继承这笔灿烂

的文化遗产，以供今天文艺创作的借鉴，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学会的成立，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三国演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将团结、组织全国从事《三国演义》教学与研究的同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言人未发，正人所偏，开创《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我们深信，《三国演义》这部伟大作品，必将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

参加本集编选工作的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世厚、王广西、杨海中、卫绍生等同志。本集编选出版，得到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胡世厚

一九八四年元月于郑州

目 次

- 序 (1)
- 《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及其它 何满子 (1)
漫谈三国故事的思想倾向 陆树伦 (9)
浅谈《三国演义》正统观念的历史进步性 孙 遵 (20)
《三国志演义》的忠义问题新说 欧阳建 (35)
论《三国演义》的主题 胡世厚 (50)
乱世英雄的颂歌
——《三国志通俗演义》主题新探 齐裕焜 (62)
《三国演义》主题新探 王 基 (78)
-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 王立言 (88)
万古云霄一羽毛
——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 邱振生 刘明涛 (101)
一个丰满可信的杰出军事家形象
——谈《三国演义》的主人公之一曹操 任昭坤 (119)
谈曹操性格的真实性 侯吉子 (128)
理想与现实之间
——谈《三国志演义》里刘备形象的创造 宋常立 (140)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 于洪江 (152)

司马懿论	叶胥冒妍	(165)
论魏延	沈伯俊	(176)
浅论貂蝉	李春祥	(191)
论貂蝉	胡邦炜	(203)
《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	黄霖	(218)
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	吴小林	(239)
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	剑锋	(255)
从《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 对比中谈《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人物的 几个问题	王洲明	(264)
《三国演义》的心理描写初探	康保成	(278)
略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构思	陈阵	(285)
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	夏炜	(297)
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	宁希元	(308)
历史事实与小说艺术		
——谈“失街亭”和“空城计”的“实” 与“虚”	李海吾	(324)
罗贯中试论	孟繁仁	(340)
罗贯中的政治观及《三国志演义》创作思想		
管窥	赵清永	(358)
试谈《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盛瑞裕	(369)
毛本《三国演义》对三国戏的影响	彭飞	(379)
明清以来三国说唱文学		

- 兼说它与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的
关系 陈翔华 (392)
- 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
——读《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所想
到的 刘敬圻 (419)
- 毛宗岗继承金圣叹小说理论评改《三国演义》
的贡献 张国光 (445)
- 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 王丽娜 (458)
- 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闻 晴 (474)
- 1983年《三国演义》研究论著、论文索引 王 钢 (485)

《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及其他

何满子

历史小说在艺术发挥上有它的局限性，这是无庸解释的。但是作为艺术魅力的辅助，它另有一种别的力量吸引读者；即，一种美感要求以外的对于历史知识的需要，吸引读者由于哪怕了解一下历史事实也好的愿望去接近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小说正像生活中的新闻一样；新闻本身也许没有提供美感享受，但人们因为关切周围世界的变动，从渴望了解它而产生了兴趣。现在的人们谈起十年动乱中的事情，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事情，内容也许并无多大的戏剧性，讲的人也许不很善于言谈，可是仍然多少能吸引听众，就因为这些已往曾经发生过的现象，都曲折地和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理解历史的兴趣产生于人们要求理解人生的愿望。归根究底，人们对（反映生活的）艺术的兴趣也是这么一回事。

小说和事实报导之间、历史小说和历史记录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不能渡过的鸿沟。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是不许损害事实、不许虚构的。撇开作家理解生活的能力的评价生活的态度，使记录真人真事能达到文学品格的，无非是两个因素。一是事件本身所蕴有的内容，它的重要性的社会意义，它的戏剧性，等等；与此相关的是人物本身所蕴有的内容，他的个性中所包含的典型意义，

他的历史地位，等等。一是作家对真实事件的选择、剪裁、配置、陪衬，对事件线索或某些过程和侧面的显豁、强调、集中，以及对别些过程和侧面的相反的处理，诸如此类。

根据上面的理解，我想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的思想、艺术和社会影响等问题。

《三国演义》为什么能吸引各阶层的群众，过去曾有人对这问题作过不同的解释。这是一部宣扬正统思想，宣扬封建伦常的小说，它也受到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的欢迎，曾被反动论客援为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论据，这当然是荒唐的。不少人用马克思的“一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社会的统治思想”的规律，说明下层群众也会接受异己的意识，这解释也然而不尽然。群众不全是为了和《三国演义》所宣扬的统治者的意识融洽无间才接受它的，唤起他们兴趣的是充满戏剧冲突的历史事件，而历史是人民和统治者所共有的。过去的历史书，从先秦的《左传》、《国语》、《国策》到二十四史，作者都是统治阶级的文人，是非褒贬也渗透着统治阶级的精神意识和价值标准，然而只要能克服文字上的障碍，即使不是专攻历史的现代读者都对它们发生兴趣，并为其中的精采描述所感动。

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可能和真相有出入的，甚至可能有严重的歪曲；但宏观地说来，所出入的和所能歪曲的只是细节，却不能改变历史事变的基本轮廓。打个比方，秦桧派的历史家和岳飞派的历史家记载南宋初期的历史时，内容肯定会十分歧异；但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岳飞死后南宋就屈辱求和了，这个历史的基本事实无法动摇，人们常说，封建社会的历史书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不错。可是，这是在社会历史运行的基础之上的统治人物的家谱，撇开了家谱，历史运行的客观状况依然俱在，并不因家谱而

给抹煞掉，这也是事实。否则，以往大批大批的史籍即使不是完全无用，也至少不能作为认识历史的基本的资料了。

剩下来的问题是对同样的历史事实的不同解释，这当然是因立场而异的。人民和统治者，统治者中的不同集团，对事实的评价都不一样。就以王朝正统来说，晋受魏禅，晋人作史当然要以曹魏为正统，否则自己的正统就失去根据了；何况曹魏建国的地区历来是政治中心所在。东晋人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其书今已不见。《晋书》本传称其书“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论者以为他是借以讽喻桓温的觊觎帝位的；但刘知几《史通·探赜》篇，却认为习氏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可见蜀汉正统的观念，是早有创导，绵延已久的。南宋偏安在江南，朱熹的《通鉴纲目》便更要强调血统论，以蜀汉作为刘姓汉室的法定继承人，为南宋的偏安局面创造正统的历史依据，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呼召亡灵为之作战的道理。与此相关，人物的褒贬也势必要和正统的改变相适应，曹操便以篡逆的祸首成了反面人物。本来，晋宋人对曹操已多微词，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晋人孔衍的《汉魏春秋》，孙盛的《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和上述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书中，就今所见裴松之引述的零章断句，对曹操已有不少不很恭维的内容，裴注所引的当时敌国人的著作如吴人《曹瞒传》、韦曜《吴书》等作品中的记载，则更多贬词，以至刘知几讥裴注为“喜聚异同，不加判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

并在另一处慨叹道：

……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啁謔小辨，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其事荒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书事》）

而这些“嗤鄙异闻”，倒有不少采自民间。有些异闻蕴蓄着人民对历史的评价，甚至世代传承而颇有影响的。对三国故事中的曹、刘两家的态度，民间自有由来已久的另一种褒贬，苏轼《志林》所记的“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恶，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从后两句话，可知士大夫如苏轼的观念里，曹操也是被置之于“小人”一边的。

习凿齿的以魏为伪国和朱熹的蜀汉正统观，可能对《三国演义》的以蜀汉为皇统有影响，但从苏轼所透露的北宋时民间心理看来，小说的这一正统观是有民间的深厚渊源的。不管这一评价的政治内容如何，小说实质上是和正史对立的民间观点的保卫、发扬乃至战胜。小说对人物的态度，它的美化刘备，神化关羽和诸葛亮，丑化曹操，都服从这一主旨。当然，正统观和人物的褒贬也并不完全一致。晋朝的正统地位是没有人与之争抢的，但《三国演义》对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父子却并不称美，当他们胁迫曹魏的孤儿寡妇，篡取皇位时，作者的同情倒反倾向于曹魏，把司马懿父子写得比曹操还狠毒狡诈。历史小说中写开国皇帝写的那样坏的，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例。

据此，小说对人物褒贬又不完全服从于正统观，这是《三国演义》和早期的《三国志平话》不同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平话》中，为了维护它的蜀汉正统观，甚至虚构出一个正统，将灭亡西晋的匈奴族人刘渊附会作刘禅的继承人，实在背离历史得太过分了。《三国演义》把故事写到《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为止，只把正统与僭伪的区分限制在三国史以内。又把《再受禅照样画葫芦》作为僭伪的曹魏的最终报应，加以历史的讽刺。对司马懿父子的颇带贬义的描写，已和蜀汉正统的观点无关。要有的话，也只是因为小说所尊为正统的蜀汉，是灭亡在司马氏父子手里的。

这样，历史上就大致有三种蜀汉正统观，即习凿齿的、朱熹的和罗贯中——不用说，这里把元代平话、戏曲和以后毛宗岗的改作也计算在内，他们和罗贯中无大区别——的。可是三者之间性质并不相同。习凿齿的本意，是撇开三国，直接以晋继承汉的正统。《晋书·本传》载他的临终上疏，申述“皇晋宜越魏继汉”的理由道：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很明白，他是以曹魏为“不正”，“犯顺”，在三国鼎立的无可奈何的局面之下，才勉强说“蜀人杖正”的。也即是说，三害相取其轻，才不得已选了蜀汉，如果“正名当事”，则“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蜀汉也应排除出正统之列。因此，实质上他是三国无正统论，或断统论。朱熹的蜀汉正统论则是为南宋政权的政治服务，依据就是血统论，这也正是蜀汉创建者刘备自

己用以号召的名义。其实，论统治的范围，蜀汉是三国中地盘最小的偏霸；论名分，和名存实亡的东汉没有关系，皇帝是他自封的。就以封建宗法观点说，血统也不能代表统治天下的正统，否则，杞国和宋国都可以自称夏朝正统或商朝正统而排除周朝的正统了。《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和习凿齿、朱熹的都有所不同。它和习凿齿的不同是很显然的，它不承认皇统的中断，晋是继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之后才“三分归一统”而取得正统地位的，开宗明义说“合久必分”也是天下之大势，皇统之常理。司马氏的江山并不象汤、武、秦、汉那样自己靠武力征服取得，而是在曹魏政权的内部壮大起来接管下来的。习凿齿不承认晋继魏统而直祧汉朝，是形而上学的诡辩，连晋朝自己也不敢承认。《三国演义》虽然也常常宣称刘备是“汉室宗亲”、“帝室胄裔”，似乎也拾取了朱熹的血统——正统论，但它的蜀汉正统观之树立，是从蜀汉的统治者刘备的仁德爱民，以及建立蜀汉的文武英雄人物的合于正统风范的描叙中完成的。也即是说，蜀汉之所以成为正统，是由于这些人物不愧为正统王朝人物的模样。刘关张的生死不渝的义气，刘备在当阳败逃时的移民渡江，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凡是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为人民群众所向往的品德和行为，都是使蜀汉无忝于正统的重要根据。关羽、诸葛亮这两个英雄人物的创造，是《三国演义》的菁英所在，他们也确是当时条件下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人物归属于正统这一边，自然是人民群众的心愿。因此，蜀汉正统观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民的正统观的反映。

至此，就得而谈《三国演义》的艺术了。它的用力之所在，就是在大体照顾历史基本面貌的条件下，塑造这几个作为小说骨干的英雄人物。这里不必重复读者们所熟知的情节以及通过情节

烘染出来的人物性格，只要指出一件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当这些英雄一一死去，直到最后诸葛亮死去以后，小说就不大能再吸引读者；大抵只是由于上文所说的要求理解历史的兴趣，才使读者能读完全书。当时的许多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可以指出的如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和曹氏之间许多起斗争，孙权死后吴国内部的政治倾轧，乃至发生于蜀汉的费祎被刺事件等，都是戏剧性极强的情节，但比起诸葛亮去世以前的情节来，在读者脑子里留下多少印象，甚至人物的名字也不很记得牢。而在此以前魏、吴两国的许多人物之所以写得有声有色，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和蜀汉英雄的戏剧性纠葛，或由于性格上彼此映照、对比才有以致之的。《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取舍和详略，也是在照顾基本历史真相的范围内，主要以完成蜀汉英雄人物的塑造为标准的。情节作为人物的行为而附丽于人物，历史本身如此，艺术也得不如此。

因此，《三国演义》的吸引人，就在于它从纷纭复杂、头绪繁杂的三国历史中，根据创造人物和情节的需要，构成线条分明的戏剧葛藤，突出重点，芟刈繁褥，把光度集中在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身上。化繁为简的结果，使内容更丰富，更能领摄全局，富有表现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虽然也有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失，但大抵是按照历史记载中人物的基本面貌进行刻画的。当然，这些人物经过民间艺人的长期创造，已不仅是只有个性的真实人物，而是赋以想象的、概括了较广的社会关系的人物了。但人物和事件的社会内容，还不失为历史真实自身所蕴含的特征，通常所谓还不太离谱。

有人曾经统计过，搬演三国故事的传统剧目共有八十多出，

其中与蜀汉或蜀汉英雄无关的，只有《捉放曹》、《凤仪亭》、《战宛城》、《逍遥津》、《红逼宫》等不到十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研究《三国演义》的思想、艺术和社会影响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八四年二月

附记：

本文是题为《〈三国演义〉和关于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的一篇讲演的一部分。根据沈禹方同志的记录，由本人改写而成。原有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已以《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为题，在八四年三月二十日的《光明日报》发表。

漫谈三国故事的思想倾向

陆树仑

关于《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目前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症结，与如何对待书中的正统思想有关。本文拟就历来三国故事与正统思想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这或许能为弄清楚《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提供一点有用情况。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一时期的历史撰写成《三国志》时，以曹魏上承汉祚，尊为正统。裴松之注《三国志》，虽然增添了大量材料，但仍沿袭着陈寿的观点，以魏为正统。不过，东晋习凿齿编写《汉晋春秋》，却别立异议，尊蜀为正统。在唐代，史学家仍以魏为正统，而诗人之中却有人如杜甫便以蜀为帝。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又以蜀为正统。自此以后，元、明、清三代，无不从习凿齿，奉蜀为正统，吴魏皆为僭国。史学家的这种以魏为正统，或以蜀为正统的观点，对三国故事的思想倾向，无疑是发生过影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曲艺艺人、戏曲家和小说家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事编写和表演三国故事的。事实上，他们也是各有自己的褒贬原则。

炀帝……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